



边疆史地丛书

英国与中国 边疆危机

1637 — 1912

高鸿志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

1637 – 1912

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

1637—1912

YINGGUO YU ZHONGGUO BIANJIANG WEIJI

高鸿志 著

责任编辑:李 彤

封面设计:安 璐

责任校对:董淑丽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字数 206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16-3354-X/K·69 定价:11.50 元

《边疆史地丛书》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由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这套《边疆史地丛书》,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把边疆史地研究推向前进。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边疆建设,繁荣边疆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举凡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列,其有关专著、资料和译稿,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8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英人东来与海疆危机的开始·····	(1)
一、	英国殖民主义者寻求通往中国的道路·····	(1)
二、	威德尔率船队至广州·····	(5)
三、	英国阴谋夺取澳门·····	(11)
四、	英军侵占澳门及其失败·····	(17)
第二章	18 世纪后期英国侵略西藏的阴谋·····	(23)
一、	博格爾与特纳进藏·····	(23)
二、	英国与中尼战争·····	(31)
三、	清王朝加强西藏边防的措施·····	(36)
第三章	英国对中国东南海疆的侵略·····	(39)
一、	鸦片战争与香港·····	(39)
二、	香港岛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基地·····	(45)
三、	觊觎九龙半岛·····	(51)
四、	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台湾的侵略·····	(53)
第四章	英国侵略西藏计划逐步实现·····	(68)
一、	英国控制同西藏接壤的尼泊尔、哲孟雄和 不丹·····	(68)
二、	游历和通商·····	(75)
三、	第一次侵藏战争·····	(85)
四、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的订立·····	(89)

第五章	云南边疆危机	(96)
	一、英国以缅甸为基地向云南扩张侵略势力	(96)
	二、英、法争夺云南与杜文秀政权	(102)
	三、斯劳登“探险队”至腾越	(106)
	四、杜文秀派使赴英	(110)
	五、大理使臣在伦敦	(115)
	六、杜文秀在对外关系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根源	(119)
	七、英国与中法战争	(123)
	八、英国吞并缅甸与中缅边界交涉	(132)
	九、英国吞并缅甸后,英法争夺云南与《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的订立	(141)
第六章	英、俄在新疆的矛盾和斗争	(148)
	一、英、俄侵略新疆与阿古柏政权	(148)
	二、英国与伊犁问题	(157)
	三、英、俄争夺帕米尔	(162)
第七章	甲午战后英国对华侵略与中国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	(172)
	一、英国与中日甲午战争	(172)
	二、英、法在云南、广西的角逐	(182)
	三、强租九龙半岛北部及其附近岛屿	(186)
	四、片马危机	(196)
第八章	20 世纪初年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及其与沙俄的斗争	(204)
	一、英、俄争夺西藏	(204)
	二、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	(211)
	三、中英交涉	(216)
	四、《拉萨条约》订立前后英、俄关于西藏的谈判	

.....	(219)
五、英、俄关于西藏的协定.....	(226)
六、英国在春丕的殖民统治与《修订藏印通商 章程》.....	(230)
七、清政府在西藏与川边的改革	(233)
八、达赖去北京	(235)
九、川军进藏与达赖出逃	(240)
十、驻藏新军起义与西藏危机	(247)
十一、英国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领土的野心	(253)
附录一 大事年表.....	(261)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266)

第一章 英人东来与海疆危机的开始

一、英国殖民主义者寻求通往中国的道路

15 世纪末与 16 世纪初,在英国冒险商人中出现了到“震旦”(Cathay)^① 去的狂潮,此种情况的产生并非偶然。

1485~1603 年是英国历史上的都铎王朝时期,随着都铎王朝的建立,英国进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英国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沿着两条道路进行:一条道路就是从 15 世纪开始的“圈地运动”。由于当时羊毛手工制造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上涨,新兴封建贵族为获取暴利,对广大小农进行了血腥的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被贵族强行占有,房屋被拆毁,大片耕地成为牧羊场,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广大农民,成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这种对农民进行野蛮掠夺的“圈地运动”从 15 世纪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初;另一条道路则是向外夺取殖民地,对殖民地人民进行野蛮掠夺,将抢劫自殖民地人民的财富转化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怀着到东方夺取殖民地的目的,英国冒险商人把向海外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中国。

^① Cathay:“震旦”或“契丹”,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

15 世纪,英国封建社会进入末期阶段,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对金属货币需求量愈来愈大,金银成为最宝贵的财富,英国出现了“黄金热”,获取大量黄金的强烈欲望,驱使英国商人去中国冒险。

英国中上层社会不仅乐于穿用来自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的丝绸衣料,而且对丁香、胡椒之类的调味品也发生浓厚兴趣。可是,随着蒙古帝国的瓦解,特别是由于 15 世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这条由中国西北经中亚细亚到达欧洲的商路几乎完全被切断,来自东方国家的产品逐渐稀少,价格昂贵,但英国中上层社会对丝绸、香料等产品的需求量却与日俱增,英国商人迫切希望直接从中国获得这些产品。

除上述原因外,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有关中国的游记,对英国中上层社会亦产生强烈影响。马可·波罗于 1275 年来华,在元朝政府任职达十七年之久,曾去过中国许多地方,《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述的中国,地域辽阔,物产富饶,城市华丽,工商业繁荣,人民生活幸福,使欧洲人羡慕不已,文明富庶的中国对英国冒险商人有着巨大吸引力,他们渴望尽快去中国发财致富。从 15 世纪起,英国冒险商人开始不断组织船队远航,希望能找到一条通往中国的航路。这个时期,欧洲造船技术的提高,航海罗盘的使用,为英国商人远航东方创造了有利条件。

1497 年(明孝宗弘治十年)5 月,冒险家约翰·卡博特(John Cabot)^① 获得英王亨利七世给予的专利权,从英国布里斯托尔出航,寻求到达中国的航路,未能成功。

1553 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约翰·卡博特的儿子色巴斯

① 约翰·卡博特(John Cabot),商人兼航海家,意大利热那亚人。大约于 1490 年全家去英国,定居于英国海港城市布里斯托尔。参看约翰·菲斯克:《美洲的发现》第 2 卷,第 2~3 页,波斯顿和纽约,1896 年版(John Fiske: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Vol. II .PP.2~3, Boston and New York, 1896)。



提昂·卡博特(Sebastian Cabot)约集一批伦敦商人,筹集资金6000英镑,组织了一家合股公司。在这个公司资助下,1553年行伍出身的威楼贝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与熟谙天文数学的航海家张塞勒(Richard Chancellor)率领一支由三艘船组成的船队,沿挪威海岸进入北冰洋,企图寻找一条通往中国的东北航路,他们在拉普兰遇上强烈风暴,张塞勒的坐船同威楼贝指挥的两艘船失去联系,1554年初,威楼贝和全体船员在穆尔曼斯克附近冻饿而死。张塞勒抵达阿尔汉格爾,并从那里去莫斯科,受到俄国统治者伊凡·雷帝接见,俄国政府同意与英国建立贸易关系。同年,伦敦一批商人乘机成立莫斯科公司,一面谋求发展对俄贸易,一面企图通过俄国开辟一条经中亚细亚去中国的商路,1557年该公司代理人安东尼·詹金逊(Anthony Jenkinson)曾去俄国和中亚细亚考察,由于中亚发生战争,英国商人经由陆路到达中国的计划未能实现。

16世纪后期,英国学者汉弗雷·吉伯特(Humphrey Gilbert)、理查德·伊登(Richard Eden)等人出版了大量讨论中国航路的论著,他们认为从英国至中国可以取道好望角或麦哲伦海峡,但前者为葡萄牙的专有航路,后者则为西班牙控制,经由这两条路去中国,时间长,风险大,通过俄罗斯至中国的东北航路已证明行不通。1566—1567年吉伯特写了一本小册子,题名为《简论通往中国新航路的发现》,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说,经由西北航路去中国,时间省,风险小,由于航程缩短,使英国在远东出售的产品远比西班牙人的产品低廉。英国国内有不少人赞同他的观点,主张探寻西北航路,1576年英国商人洛克(Michael Lok)资助冒险家佛罗比谢尔(Martin Frobisher)出航,探索西北航路。佛罗比谢尔的船队抵达巴芬岛,从此地带回一些矿石,据一位意大利化验师说内含黄金,洛克断言佛罗比谢尔发现金矿。于是伦敦商人立即筹集资金组成“中国公司”,洛克出任终身总裁,伊丽莎白女王也投资1000

英镑并借给王室船只“援助”号,以示支持。1577—1578年,佛罗比谢尔两次出航,企图去巴芬岛采集黄金并探察前往中国的西北航路,均以失败而告终。佛罗比谢尔三次航行共耗资 20160 英镑,^①“中国公司”总裁洛克债台高筑,宣告破产,被捕入狱。

1578 年英国海盗德雷克(Francis Drake)率领一支船队胜利通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途中抢掠了一艘满载金银的西班牙船,经好望角,于 1580 年返回英国。德雷克环球航行成功增强了英国商人到达中国的信心。

1582 年(明神宗万历十年),英国船长斯蒂芬斯(Stephens)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斯蒂芬斯是第一个抵达印度的英国船长。^②继斯蒂芬斯之后,加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也于 1586 年出航,成功地抵达菲律宾。1588 年 6 月,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为英国商人和冒险家远航东方消除了一大障碍。

1591 年,雷蒙德(Captain Raymond)和南凯斯特(James Lancaster)率领船队再次从英国出航,离开好望角后,雷蒙德的坐船在海上失踪,南凯斯特抵达苏门答腊,1594 年回国。斯蒂芬斯、加文迪什与南凯斯特等人远航东方成功,使英国殖民主义者深受鼓舞,他们决定继续努力,争取尽快到达中国。

英国商人远航中国的计划,始终获得英国政府全力支持。1596 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杜德里爵士(Sir Robert dudley)组织一支船队去中国,伊丽莎白女王特地为随船前往中国的伦敦商人阿伦(Richard Allen)和布鲁姆菲尔德(Thomas Bromfield)致函中国皇帝,这支由伍德(Benjamin Wood)率领的船队,途中遇难,

① 项特:《英印史》卷 1,第 206 页,1966 年纽约版(W.W.Hunter: A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Vol 1, P.206, New York, 1966.)。

② 郎宁、库宁:《上海史》,第 89 页,1921 年版(Laning—Couling: History of Shanghai. P.89)。



伊丽莎白女王致中国皇帝的信未能到达中国。

1600年,伦敦一批商人组成资金雄厚的东印度公司,该组织获得对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经营垄断贸易,从事殖民活动的特权。从此,东印度公司不断派遣船队至东南亚,从1602年至1615年,这个公司先后在南洋万丹(Bantam)和日本的长崎、平户建立了商馆、同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做生意,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商人出售棉毛织品、象牙、木材等商品,购买中国瓷器、生丝之类商品,运往英国。

1604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詹姆斯一世继承王位,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建立。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尽管仍为农业国,在全国450万人口中,农村居民约占75%,但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冶金、煤矿与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尤为显著,对海外市场的需要愈益迫切,重商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广为传播,成为英国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从1497年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英国商人已经到达中国的大门口,他们没有也绝不可能在中国的大门前长期徘徊,必然会叩击中国大门。

二、威德尔率船队至广州

17世纪,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逐步被荷兰取代,葡萄牙为了维护其在东方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不得不依靠后来居上的海上强国英国。1634年,葡萄牙驻果阿总督同东印度公司签订休战与自由贸易协定,邀请英国商人到东方贸易。1635年,东印度公司派出“伦敦”号船,在船长威理斯(Captain Willis)指挥下,从印度苏拉特驶往中国,7月抵达澳门。“伦敦”号船是第一艘成功抵达中国领土澳门的英国货船。由于澳门葡萄牙当局从中阻挠,广东地方政府和商人对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心存疑忌,同年10

月“伦敦”号被迫离开澳门返回印度。东印度公司经由澳门同中国通商的计划虽遭失败,但科亭协会所派的船队却实现了中英两国首次接触。

当葡萄牙当局欢迎英国商人到东方贸易的消息传至伦敦,从事海外贸易的伦敦商人威廉·科亭(William Courteen)遂邀集一批商人,于1635年组成科亭协会(Courteen's ASSociation),准备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有感于东印度公司未能在东方站稳脚跟,而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却“在那里经营持久而充满希望的贸易”^①,对新成立的“科亭协会”极表支持,特许这个组织到果阿、中国沿海与日本等地贸易。1635年,科亭协会组建了一支船队,聘请约翰·威德尔(John Weddell)为船长。威德尔原为英国海军军官,1625年曾指挥英国舰队在苏拉特打败葡萄牙舰队。后任职于东印度公司,有丰富的航海经验与指挥作战能力。他于1635年率科亭协会的船队从英国出航,抵达果阿,在果阿出卖了所装载的货物,购买了丝和香料返回英国。次年,科亭协会又派他率船队去中国。威德尔船队由四艘船(“龙”号、“太阳”号、“喀特琳”号与“殖民者”号)与两支大舢板(“安娜”号与“发现”号)组成^②,随同威德尔前往中国的有:管货员纳撒尼尔·蒙特尼(Nathaniel Mountney)及其弟约翰·蒙特尼(John Mountney),商人彼得·芒迪(Peter Mundy)与熟悉葡萄牙语的汤马斯·罗宾逊(Thomas Robinson)等人。行前,英王查理一世向威德尔下达一系列指示和敕令,其中包括威德尔有权实行军事管制与捕获敌船,还为威德尔船队致函葡

①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5页,1926年牛津版(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Vol. I, P.15, oxford, 1926)。

② 伊梅斯:《英国人在中国》,第13页,1974年伦敦版(J.B.Eames: The English in China. P. 13, London. 1974)。



葡萄牙驻果阿与澳门的总督。

威德尔船队于1636年4月16日离开英国,10月8日抵达印度果阿,1637年(明崇祯十年)初离果阿,同年6月25日抵达澳门附近海面。盘据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担心中英贸易影响他们在澳门的商业利益,对威德尔船队的到来持反对态度,威德尔遂决定直接去广州,船队驶至凼仔停泊,派出“安娜”号船前往珠江探测水道。英国船队的到来引起广州地方政府的注意,广州地方当局先后派遣官员至英船停泊处询问英人来此的目的和要求,调查英船人数、武器,运载的货物以及购货款的数额。^①7月22日,前往珠江探测水道的“安娜”号船返回凼仔,向威德尔汇报探测情况。8月初,威德尔率船队驶入珠江,向广州进发,途遇中国兵船,中国兵船官员称新来的英国人为“红毛夷”,警告威德尔船队不得驶向广州,应转往大屿山停泊,并说广州当局已在江中沉船,威德尔置若罔闻,命令船队继续上驶。8月8日,英国船队在虎门附近的亚娘鞋(A-nunghoi)停泊,8月12日同亚娘鞋炮台的中国守军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国守军战败退走,威德尔派出一百多名水手进入炮台,扯下中国旗,升上英国旗,将炮台上的中国炮搬上英船,同时公开抢劫和夺取行驶于珠江的民船,强迫中国渔民带信给广州地方当局,为他们攻占亚娘鞋炮台辩护,要求自由贸易。

8月15日,广州当局派遣一个叫保罗·诺瑞蒂(Paulo Noretta)的黑人翻译(汉名李叶荣,广州总兵陈谦的亲信)前往英船了解情况,诺瑞蒂自称为中国政府官员,他告诉威德尔,如归还从亚娘鞋炮台抢夺的中国炮和其他物资,像葡萄牙人一样缴纳税银,通商愿望定能实现。^②翌日,他偕同约翰·蒙特尼与汤玛斯·罗滨逊去广

①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18页,1926年牛津版。

② 同上书,第20页。

州,19日夜,蒙特尼与罗宾逊从广州返回,告知威德尔他们在广州受到总兵陈谦接待。

此时,两广总督熊文灿已调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新总督未至,代管两广军务的广西巡抚郑茂华、海道副使郑觐光等高级官吏均力主迅速将英国船队赶走,陈谦迫于上级和同僚的压力,不得不表示赞同。他同海道副使郑觐光联名发布文告,命诺瑞蒂将此文告向威德尔当面宣读。

8月21日,诺瑞蒂携带文告前往英船停泊地会晤威德尔。他在用葡语译述文告时,对该文告内容肆意歪曲,诺瑞蒂谎称:鉴于葡萄牙人拒绝英人在澳门贸易,英人愿意纳税,兹同意英人任意买卖商品。可选择三处地方作为英船停泊之所。他要求威德尔派人随他去广州买货。其实,上述文告严厉谴责“红夷”(指英人——笔者)攻击亚娘鞋炮台的强盗行径;关于准许英船贸易问题,文告说此事须禀明上司,如无上司许可,英船“不得贸易”,文告命令“红夷”船只立即启航,驶往外洋,并警告英人说“如敢损毁一草一木,我军誓将尔等消灭,不使尔等片帆留存”。^①威德尔不明真相,对诺瑞蒂的谎言深信不疑,交还所俘获的中国炮和商船,派罗宾逊与蒙特尼兄弟携带巨款前往广州。英人至广州后,住郊区叶姓宅邸。

通过诺瑞蒂从中牵线,罗宾逊等人以重金贿赂总兵陈谦,获准在广州贸易,这些英国人“招摇市上,奸民视之若金穴”^②,诺瑞蒂及其商界朋友揭邦俊、叶贵同英人紧密勾结,代为购买酒、米、糖、姜等产品。为便于同已至广州的英人联系,威德尔不顾广州官府反对,命令船队驶至虎门停泊。

① 中文原件未见,此处从英文回译。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21页,1926年牛津版。

② 《明史》关于英国船队至广州的记载与英方记载大体吻合,但误将英国写作荷兰,见《明史》,外国6,《和兰传》。



广州地方当局见英国船队不听劝阻,深入内河,决定采取“以汉御澳,以澳御红”^①的策略,海道郑觐光致函澳葡当局,要他们采取措施尽快促使英国船队离开中国海域,否则他们将承担最坏的后果。

9月6日,澳葡当局向威德尔送交抗议信,要求英国船队离开中国。威德尔自以为有陈谦作后台,对葡萄牙人的抗议不屑一顾,他在复信中指责澳葡当局的来信“充满毫无理由的威胁性语句……想迫使我们放弃如此肯定有利的事业”。他还在复信中讽刺澳葡当局说:“此地并非属于你们,而是中国国王的领地,为什么我们还需等待卡斯提尔国王或他在这些地区的卑微的总督发给许可证呢?”^②

威德尔采用武力手段强迫中国通商,引起广州官方强烈不满,他们以诺瑞蒂“擅带夷财入省”的罪名,将其逮捕,严刑审问,诺瑞蒂供称曾为:“红夷”购买糖、米、酒等物,并“带同夷目二名,夷仔一名在揭邦俊家”^③。于是擅自同英人贸易的商人揭邦俊、叶贵均被逮捕,押发广州府监禁,来广州的罗宾逊等人亦被囚禁,英货没收。总兵陈谦惴惴不安,慌忙向朝廷上疏请求调走。广州形势迅速发生不利于英国人的变化。

9月上旬,广州地方当局采纳参将黎延庆等人的建议,采用火攻战术,命把总陈邦基、吴一凤“召募善火闽兵张奇等四十名,备办火具柴草,选验年久兵船五支,充作火船”^④,各船用铁链联结,9月10日凌晨,以黑夜为掩护,向英船驶去,将近英船,潜伏船中的水

① 《明清史料》乙编,第8册,第756页,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柯特斯:《澳门和英国人,1637~1842》,第18~19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Austin Coates: Macao and The British, 1637~1842. PP. 18~1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③ 《明清史料》乙编,第8册,第752页。

④ 同上书,第751页。